

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

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，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，都是很敬重的。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，古人且不说，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，就是潘雨廷先生了。

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，对于《易经》的各种流派，《易经》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，说来真是如数家珍。最初，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，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诺而安排的，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，是我向过去的老朋友，时任中文系副主任、研究所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，而他评上副教授、正教授，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。

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。有人对之颇多挑剔，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，这是难怪的；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，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、神乎其神，而一些医生、技击家、气功师、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，以为获得他的真传，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先生学术的粹精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，只抱住一点，就随心所欲，任意发挥，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。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，以为永怀，并奉献于对《周易》有同好者。

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，就一直居家研《易》，在到



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，从未正式有过工作。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。我的难友、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、其兄皆有交往，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。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，所以有充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。据潘先生自己说，他的研《易》，所以能锲而不舍，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是能“转益多师”的，就历代哲人的《易》学研究来说，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。

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形先生和薛学潜先生。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、丁济华医生一起，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，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、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，随即因十年浩劫而与世隔绝。及至拨乱反正、恢复自由后，再因张大文、黄福康诸君之介，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。才知杨、薛两先生都已归道山，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，惟成一先生健在。同时得交与杨、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。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、薛两先生的轶事，而傅先生尤其其详。可惜我今撰此文时，成一先生早已辞世，两年前，傅先生又忽告病故。不然，很多存疑的事，都可向他们请益的，这是很大的遗憾。

当初我们去听课，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。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(1838-1894)的长孙，父薛翼运(1862-1929)，字南溟。薛先生小时，其父曾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，讲授过查理·斯密所编的《小代数学》。钱老有文记其事，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。先生字毓津，尝游历世界各国，创办实业，著有《政本论》。桐城吴肇甫(汝纶)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，称许他“可绳乃祖”。后潜心于《易》学，专著有《〈易〉与物质波量子力学》、《超相对论》等书，颇流行于海外。我们去听课时，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。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“宇宙起源与河图、洛书”这一命题，发了二十多页讲义，听课的人很多，男女老少，济济一堂，有的还不时点头，我们却都听

